

# 梁启超的报刊客观性思想

孙 健

**摘要:** 客观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种重要原则,它是伴随着近代西方报业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历来为报界所重视。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民族报业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时期,梁启超作为中国早期著名的报业活动家,对报刊的客观性有着独特的认识视角和实践经历,并在论著和报业实践中留下了很多关于客观性的轨迹。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国人自身的一些认识局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早期报人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报刊客观性思想还存在不少缺陷,客观性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着冲突,并且客观性更多的是作为工具和策略而存在。

**关键词:** 梁启超; 报刊; 客观性

作为中国早期著名的报人,梁启超从事报业的时间长达 27 年,他创办和支持过的报刊有 17 家之多,如《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庸言》、《改造》等,他是清末民初影响最大的报刊政论家、宣传鼓动家。除了具有丰富的办报实践经历之外,梁启超还著有《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敬告我同业诸君》、《〈国风报〉叙例》、《中国各报馆始末》、《中国各报存佚表》等新闻学专论,其中蕴含着他从西方新闻学理论中汲取以及办报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的新闻思想。

在西方,客观性不仅是一种报道规则,还是一种职业理想。在中国报业的早期发展阶段,客观性思想随着中国政治环境和报业环境的变化经历了一次变迁。梁启超的办报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且办报是其实现政治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随着其多变的政治态度也不时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甚至会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但在他漫长的办报生涯中,报刊的客观性思想还是经常从其众多的新闻思想中凸现出来,是我们研究早期报刊的客观性思想时所无法回避的。

## 一、报人素质与客观性

从报纸对舆论的重要影响角度,梁启超论述了报人素质的重要性。他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提出,报人要有“五本”:一为常识。报馆及新闻从业人员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既要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又要具备社会科学知识;既要了解本国大事,又要了解世界大事;既要具备历史知识,又要关注现实。二为真诚。报馆及新闻从业人员以真诚的态度发表意见,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凭其良知发表观点,这样才能有助于健全舆论的形成。三为“直道”。“国之所贵乎有舆论者,谓其能为国家求多福而捍御其患也。是故不利于国民者,则去之当如鹰鹯之逐鸟雀也。然凡能为不利于国民者,则必一国中强有力之分子也,故必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精神,然后舆论得以发生。”<sup>①</sup>因此,报人不畏强权、刚正不阿的精神对舆论的健康极为重要。四为公心。报馆及新闻从业人员不能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是非善恶或怀有党派偏见,而是要站在公共立场上,超越党派之外,要以公众利

收稿日期: 2013-06-28

基金项目: 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项目“民国报人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研究”(项目编号 ZZszf13008); 上海政法学院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客观性: 民国报人的新闻专业主义”(项目编号 2013XQNO2)。

作者简介: 孙健, 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 传播学博士(上海 201701)。

①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9-561页。

益为评判标准来发表议论,这一点对于客观反映事件的本来面貌是极为重要的。五为节制。即在新闻报道过程中,报馆及新闻从业人员一定要控制舆论的范围和强度,要有所节制,防止炒作所造成的狂热,否则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梁启超提出的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这“五本”,除了“节制”以外,都与报刊的客观性有着重要的联系。他认为,只有掌握丰富的常识,报道的新闻和发表的评论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基础之上,报人才能具有良好的判断力,报道或评论才能保证准确性、客观性;报人持有真诚的态度,从国家利益出发,具有不畏强权、刚正不阿的品格,对报纸保持客观的风格更为重要;公心可以使得报人能够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不党不偏,客观反映事实。此外,梁启超还在《〈时报〉发刊例》中对“论说”也提出了“公”的要求。他指出,立论时要做到“忠告”,要以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为重,不附于一党一派之见,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sup>①</sup>。

在实践中,梁启超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他对报人所提出的要求。1915年,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批评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做法。袁世凯得知后,立即派人找到梁启超,要以20万银元巨款买下此文,但梁启超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政论文章,体现了他不畏强权、刚直不阿、客观公正的办报态度。

## 二、报纸的独立性与客观性

除了报人的素质会影响客观性以外,梁启超认为,报纸地位的独立性也是客观性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一方面是经济上的独立,这是报纸在其他方面实现独立性的前提;另一方面是言论独立,这是报纸独立性的主要表现。

梁启超十分看重报刊的经济独立,认为这是言论独立的前提,失去了独立的精神就失去了报刊起码的品格,因此经济独立是保证报刊“指导社会、矫正社会,而万不容玩弄社会、逢迎社会”天职的保证,是梁启超报刊客观性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此,他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第三部分《中国报馆之沿革及其价值》中曾有论述。他说:“以故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纤毫之影响。大抵以资本不足,阅一年数月而闭歇者十之七、八。……〈国民报〉、〈开智录〉,亦铮铮者也,而以经费不支,皆不满十号,而今已矣。此实中国数十年来报界之情状也……推原其所以致此之由,盖有数端:一、由于创设报馆者,不预筹相当之经费,故无力扩充,或小试辄蹶。”<sup>②</sup>办报的实践经历使梁启超明白,报馆要独立生存和发展,要实现言论自由,必须以经济独立为前提,经济地位受到控制,客观性必然会受到影响。

在为《时事新报》发行五千号写的纪念辞中,梁启超感慨说:“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报馆恃广告费以维持其生命,此为天下通义;在产业幼稚之中国,欲恃广告所入以供一种完善报纸之设备,在势既已不可能,而后起之报为尤甚。”<sup>③</sup>在梁启超看来,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论,要实现报纸的经济独立是十分困难的。然而,他又对报纸依靠其他势力获得经济支持的做法持反对态度。“同仁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以成性,常觉得金钱何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最少亦受牵制。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受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制,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之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矢,无论经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时事新报》

<sup>①</sup> 梁启超:《时报发刊例》,见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67页。

<sup>②</sup> 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49页。

<sup>③</sup> 梁启超:《本报五千号纪念辞》,《时事新报》1921年12月10日。

的经营十分困难,“十年间,盖无一日不感受此种痛苦。力竭声嘶,不能支而思舍去者,不知几何次矣”<sup>①</sup>。

除去经济独立之外,梁启超还认为,报馆的言论独立是“有益于国人”、发挥社会责任的前提。他在《庸言》特别启事中说,希望报馆能“极力保持言论独立精神,与一切个人关系及党派无涉”。<sup>②</sup> 处身政党之中的梁启超,一直推崇“独立”的精神,认为“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只有凭独立的精神,世界才能“长不灭而日进化”。尽管报章渐渐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而梁启超作为保皇派、立宪派的领袖,积极参与同革命派的论战,但他认为仍应坚持“不偏不倚”才能有益国事:“若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以排挤之;或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不问是非曲直,不顾前因后果,而壹惟反对之为务,此皆非以沽名,即以快意,而于舆论之性质,举无当也。”<sup>③</sup>在梁启超看来,报馆与政府地位上是平等的,“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sup>④</sup>,报馆的独立性对于报纸发挥其积极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夫报之所以有益于国人者,谓其持论之能适应乎时事也;谓其能独立而不倚也;谓其能直陈利害,先乎多数人所未及察而警告之也;谓其能矫正偏颇之俗论,而纳诸轨物也;谓其能补多数人常识之所未逮,而为之馈贫粮也;谓其能窥社会心理之微,针对发药,而使之相说以解也;谓其对于政治上能为公平透亮之批评,是当局者有所严惮也;谓其建一议发一策,能使本国为重于世界,四邻咸知吾国论所在而莫敢余侮也。<sup>⑤</sup>

尽管梁启超认识到了报纸的独立性对于客观性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然而由于其本身政治取向所带来的局限性,使其在贯彻报纸独立性方面始终不够彻底。相比之下,在坚持独立办报、保持报纸客观性方面,与其同一时代的汪康年不仅在思想观念上更为坚决,在办报实践上也更胜一筹。

汪康年是中国较早的职业报人。在一生的办报实践中,他形成了诸多对报刊的独特认识,并已经具有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作为民间报人,汪康年始终坚持独立办报,大胆发言,不为各种势力所操控,对报刊的客观性思想有着深入的见解。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利于报纸的经济独立,但是通过募捐、广告、发行等方式,汪康年的报纸经营取得了成功,其创办的报纸没有因为经济原因而影响正常运行,这比起梁启超经常为办报经费而苦恼多了些从容。独立的经济地位也使其保持了“商款商办、民间办报”的方针,报纸避免了因经济的不独立而带来的言论不独立,为报纸客观、公正报道事实,反映社会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在报纸的运行过程中,汪康年也一直努力确保报纸的政治独立,不为外部势力所操控。汪康年在创办报纸的时候得到了张之洞等人的帮助,在报纸发行等方面也得到了一些官员的支持。尽管如此,但他还是通过各种方式逐步摆脱朝廷对报纸的控制,因为他认为站在民间客观的立场上对政府进行监督是报刊的责任。他曾在《京报》发刊首期中指出,甲午战争以后,“顾报章虽多,然于时事多未敢深论之,或辄致殃咎。”因此,他创办《京报》的目的是“处今之时,合同志结团体,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犹惧晚也,遑恤其他。”<sup>⑥</sup>汪康年的报纸先后得罪过庆亲王奕劻、两江总督端方等人。创办《刍言报》时期的汪康年已是一个职业的批评家,他目光犀利,公正不阿,从权贵到民间人士,一律抨击不误;他具有独立见解,从不人云亦云<sup>⑦</sup>。

为了保持报纸的独立地位,汪康年想方设法,甚至抵制光绪皇帝的诏令。康有为为了让梁启超取

① 梁启超:《本报五千号纪念辞》,《时事新报》1921年12月10日。

② 梁启超:《本报特别启事》,《庸言》25、26期合刊号,1914年。

③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560-561页。

④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见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55页。

⑤ 梁启超:《〈京报〉增刊国文祝辞》,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2822页。

⑥ 汪诒年:《汪穉卿先生传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9页。

⑦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53页。

代汪康年担任《时务报》总理,上书光绪帝欲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命梁启超督办其事。汪康年上书朝廷说明《时务报》是其筹款所办,由民间集资而成;同时在《国闻报》上发表声明,声明《时务报》是其个人创办,因“时务”二字为钦差专享,愿将报纸更名为《昌言报》,《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清政府被迫派黄遵宪回上海处理报纸归属问题,最后因戊戌政变爆发而结束。可见,汪康年视报纸的独立地位为生命,不惜抗旨以保持报纸的独立。与梁启超相比,汪康年的办报活动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

### 三、史家精神与报刊的客观性

1902年,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论及办报的“史家精神”。他说:

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故史家必有主、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外国所发之现象,报之客观也;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推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主观也。有客观而无主观,不可谓之报。主观之所怀抱,万有不齐,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sup>①</sup>

首先,史家精神要求办报要对历史负责。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梁启超提出办报要有史家精神,就是要求报纸要有真实性,今天的报纸就是明天的历史,报纸要对历史负责。梁启超对当时报人信口雌黄、妄论是非的状况十分不满。1904年他撰《〈时报〉发刊例》指出:“本报纪事,以正为主。凡攻讦他人隐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概严屏绝,以全报馆之德义。”<sup>②</sup>

其次,史家精神中有着正直、独立的思想内涵。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才“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矣”<sup>③</sup>。因此,梁启超提出的史家精神是建议报纸不畏强权、言论独立,敢于客观公正地报道社会现实。这一观念在当时也为诸多学者和报人所认同。

谭嗣同认为报纸是民史,他指出:“新会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于民之生业糜得而祥也;于民之教法糜得而纪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糜得而必录也,而徒专笔削于一己之私,滥褒诛于兴亡之后,直笔既压累二无以伸,旧闻遂放失而莫之恤。溢之曰官书,官书良可悼!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暗暗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sup>④</sup>

章太炎曾在《实学报叙》中说:“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sup>⑤</sup>1912年,章太炎在《新纪元报发刊词》中对“史家办报”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日报之录,近承乎邸钞,远乃与史官编年系日者等”,“今史官既废不行,代有日报”<sup>⑥</sup>。

蔡元培在为徐宝璜的《新闻学》所作的序言中说:“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报告,非犹今新闻中有专电通讯若译件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sup>⑦</sup>

胡政之对新闻记者与史官的关系也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在《中国新闻事业》一文中指出,新闻记者与昔之史官不无相同点,惟史官多记载皇帝之起居,新闻记者多叙述民众之生活。史官应有不畏强

①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引自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56页。

② 梁启超:《〈时报〉发刊例》,《时报》1904年6月12日。

③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12页。

④ 谭嗣同:《〈湘报〉后叙》,见《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9页。

⑤ 章太炎:《实学报叙》,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0页。

⑥ 章太炎:《〈新纪元报〉发刊词》,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正论选集》下,第600页。

⑦ 蔡元培:《蔡序》,见肖东发、邓绍根编:《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权之精神,不惜杀身成仁之意志,而兼具才学识,新闻记者正亦如此。<sup>①</sup>

由此可见,对于新闻和历史、新闻记者和史学家,早期的学者和报人有着相似的看法,即新闻和历史之间、新闻记者和史学家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可以用写史的方式记录新闻,新闻记者应该具备史学家的某些素养。

可以说,史家精神是对梁启超报刊客观性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概括。梁启超首倡“史家精神”之后,许多报人纷纷响应,主张以史家的态度办报,结合各自的办报经验和办报理念深化了史家精神的内涵,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史量才。史量才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观,不断完善“史家精神”,最终创立了为后人所称道的“史家办报”模式<sup>②</sup>。

#### 四、理论与实践上的冲突

近代报刊传入中国以后,具有开明思想的中国人将其作为一种新事物,逐渐接受、利用并将其发展到了初步的规模。早期的国人在办报中形成了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他们要求报纸具有独立的地位、要求报道真实客观、注重平衡、反对党报思想,形成了初步的报刊客观性思想。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参与办报国人自身的一些认识局限,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报刊客观性思想还存在着不少缺陷,甚至在理论与实践上是存在矛盾的。梁启超作为早期报人的代表,这些缺陷与问题表现得更为集中和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性与报刊宣传之间的冲突。梁启超在办报时主张应有史家精神,不仅要保证报纸要有真实性,同时报纸应该不畏强权、言论独立。在《〈时报〉发刊例》中,他写道:“本报纪事,以确为主。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若有访函一时失实者,必更正之……本报纪事,以正为主。凡攻讦他人隐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概严屏绝,以全报馆之德义。”<sup>③</sup>但在实际的办报活动中,梁启超的政治观点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从维新到接触革命思想,从革命到保皇,从保皇到立宪,这些变动都直接反映在了其所办的报刊之中。以其主办的《清议报》为例,他在《清议报》上的言论,最初表现出的是戊戌变法后的悲观情绪,对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抨击。为了配合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是与客观性相悖的,在其言论中存在不少欺骗性的宣传。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梁启超甚至说到:“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sup>④</sup>在实际办报过程中,梁启超的做法也经常与其真实、客观的观念相背离。所以,梁启超尽管曾以报业领袖的身份在新闻界叱咤风云,但当他在1903年公开反对群众革命斗争,为了攻击对立面不惜歪曲事实、造谣中伤的时候,新闻报道和言论已经逐渐丧失了存在的起码条件——真实性,这也是梁启超领导的《新民丛报》在后来与革命派论战中失败并导致该报倒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注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却忽视新闻真实性——将宣传凌驾于新闻之上的做法,对后来办报者只灌输某种思想与精神而忽略新闻真实性与客观性的政治功利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sup>⑤</sup>。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的《本報告白》中宣布:“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中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开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之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洋,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

① 胡政之:《中国新闻事业》,见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民国丛刊》第二编第48卷,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243页。

② 董天策、谢影月:《“史家办报”思想探究》,《新闻大学》2006年第2期。

③ 梁启超:《〈时报〉发刊例》,见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67页。

④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1984年,第39页。

⑤ 雷蕾:《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的关口》,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32页。

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辞费也。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sup>①</sup>可见,梁启超主张语言平和、适度,具有初步的新闻专业主义特点。

然而,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梁启超主张使用激烈的言论,或用“骇”的手法来实现宣传目标。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梁启超讲到:“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皆静,而群治必以沈滞矣。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于所罕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sup>②</sup>梁启超认为,只要能够达到好的宣传效果可以采取极端的手段;只要这种手段适合受众的心理需求,可以牺牲新闻的客观性。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点。近代国人办报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只要能够实现其政治目标,新闻的客观性观念会自然地落入服务政治目标的窠臼里,缺乏西方对这一思想观念价值合理性的思考。

二是客观性与党性之间的冲突。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之后,对西方新闻业的认识更加深刻。他看到了日本、欧美各国报纸在宣传、选举中的巨大作用,开始认识到报纸作为政党工具的巨大作用。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写道:“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的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sup>③</sup>

尽管梁启超认为《清议报》居于党报和世界报之间的位置,并且他也希望该报能朝着世界报的方向前进,但在实际的办报实践中他却很难做到,他总是将党性凌驾于客观性之上。梁启超的政治本位思想从其报纸中论说和新闻报道之间的比重就可以看得出来,其政治主张的阐述与宣传,对封建制度的抨击都主要是通过政论来实现的,新闻报道在其参与报纸中多处于弱势地位。他在报道事实和提供意见时,往往也是以政党的立场来选择、报道与评价新闻事实,不愿意听到不同立场的声音。

1904年6月,康有为、梁启超出巨资,狄葆贤在上海创办《时报》,由狄葆贤来主持日常事务。康、梁欲把《时报》办为保皇党在内地的“机关报”。但狄葆贤却以“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纸”为己任,希望把《时报》办成一份全新面目的日报,并且不愿与康梁的政闻社走得过近。梁启超指出:“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于内地,而此报至不能为我机关,则要来何用,无怪诸人之愤愤也。”<sup>④</sup>梁启超坚决主张派徐勤前往“整顿”,后康有为、梁启超因感该报不能为其党派所控制,而收回股金,《时报》遂归狄葆贤独营。《民报》和《新民丛报》两派之间的论战,梁启超作为保皇派唯一的应战者,其党性思想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看出,在梁启超所办的报纸中,党性是居于客观性之上的。

## 五、作为工具与策略的客观性

西方的新闻理念随着报业传入中国,国人开始认识到报刊在启发民智、开通风气、宣传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巨大作用。早期国人在看到了英国《泰晤士报》在西方的社会地位后羡慕地发出感慨:“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sup>⑤</sup>可见,早期报人希望将报刊及其所附带的客观性理念作为一种工具和策略,期望能通过报刊对

① 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

②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336-337页。

③ 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53页。

④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2-433页。

⑤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6页。

社会产生影响,实现自己在政治上的追求。

考察中国早期报人从事新闻事业的过程,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实用理性始终起着支配作用,对现实政治的关照则具体指引着其对西方新闻理念的选择和认知。早期的王韬在考虑现代报纸的作用时就提出:“辅教化之不及也。乡里小民不知法律,子诟其父,妇谗其姑,甚或骨肉乖离,友朋相诈,谤张为幻,寡廉鲜耻,而新报得据所闻,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于闾胥之觥挞也”<sup>①</sup>，“其益于国事如此,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是,每与政府通声气”<sup>②</sup>。王韬主张办报“义切尊王”,以此达到“强中以攘外,谏远以师长”的目的。不管是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还是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其中表达的皆是报纸之于政治的巨大作用,他们考虑的多是如何使“君恩得以下逮”、“民隐得以上达”。所以这一时期的报人多将报纸和政治、国事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眼中报纸是“国之利器,不可假人”,是“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描述中,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sup>③</sup>。

由于政治出发点和实用理性的主导,新闻事业包括新闻事业所蕴含的各种理念诸如新闻自由、客观性、真实性等都被国人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诠释,并使之服务于政治、国事等传统士人所追求的目标理想。梁启超在《〈京报〉增刊国文祝辞》中谈到:“夫报之所以有益于国人者,谓其持论之能适应乎时事也;谓其能独立而不倚也;谓其能直陈利害,先乎多数人所未及查者而警告之也;谓其能矫正偏颇之俗论,而纳诸轨物也;谓其能补多数人常识之所未逮,而为之馈贫粮也;谓其能窥社会心理之微,针对发药,而使之相说以解也;谓其对于政治上能为公平透亮之批评,是当局者有所严惮也;谓其建一议发一策,能使本国为重于世界,四邻咸知吾国论所在而莫敢余侮也。”<sup>④</sup>梁启超认为,报馆的言论独立是“有益于国人”、发挥社会责任的前提,言论独立又是保证客观性的重要条件。然而,当这些与其所重视的“国事”发生冲突时,他会让新闻事业为国家权力让路,这正是对其后来向袁世凯进言“明为舆论之仆,暗为舆论之主”行为的最好解释,新闻客观性在与其认定的振兴国家的终极目标发生碰撞时成为牺牲品。早期很多报人首先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以改造社会、振兴国家为己任的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政治理想构成了早期报人新闻思想的根据,并通过与西方新闻思想的嫁接,成为他们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

中国早期报人不仅把客观性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也以之作为一种现实斗争的策略。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来重视“言禁”,直到清政府的新政时期,“言禁”才逐渐放开,民众具有了创办报刊的自由权利,但其间也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不断斗争。早期报人逐渐认识到办报宣传的重要性,开始在国内积极开展办报与宣传活动。在办报的过程中,与客观性相关的诸多因素诸如言论独立、报纸独立等成为了早期报人争取办报权利的斗争策略。

早期报人在争取报纸独立地位的时候,指出报纸具有与政府平等的地位。梁启超在论述报刊与政府的关系时指出:“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sup>⑤</sup>这时,梁启超所谈到的客观性因素“地位平等”、“公言”是作为争取言论自由权利的策略而提出的。梁启超还提出报纸的“两大天职”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sup>⑥</sup>他认为,政府没有权力不能成事,但是权力也需要制衡,受到监督,否则就会滥用职权,所以需要报纸作为

① 王韬:《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申报》1878年2月19日。

②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24页。

③ 陈力丹:《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现代传播》1996年第3期。

④ 梁启超:《〈京报〉增刊国文祝辞》,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2822页。

⑤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见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55页。

⑥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见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54页。

“国民公意”监督政府,对“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外国所发之现象,报之客观也”<sup>①</sup>,这时候客观性是作为争取报刊独立、合法社会地位的一种策略而存在的。除此之外,在办报的过程中,客观性也经常被作为发表意见的策略而使用。

梁启超报刊客观性思想的这些缺陷或者说局限性,是由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造成的。早期的中国报业产生于内忧外患、国家积弱的社会背景之下,奋发图强、变革维新、反抗侵略是当时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报刊的传入使得早期报人认识到了报刊在启蒙思想、参政议政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这为一心报国图强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工具,同时这也十分符合传统士人立言报国的政治路径选择。报刊成为宣传政治主张、救亡图存的有效手段,因此中国早期的报刊必定是为政治理想、救亡图存等外衣所包裹,早期报人的新闻理念也必定是为崇高的政治目标所催动,有关新闻事业的思考始终无法脱离政治理念这个核心。因此,“中国这种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使得中国新闻事业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传播媒介,而主要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现和存在的。”<sup>②</sup>另外,早期报人所接受的教育多为儒家的传统教育,深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教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态度是当时所有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人格理想,新闻事业在其心目中只是其作为实现民族、国家利益的工具。在西方思想大量涌入的时代,早期报人的思想受到大量新思想的冲刷,甚至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只要是对其政治目标有用,就会加以肯定、宣传。这使得其在理论逻辑上常常会陷入混乱,甚至在实践上会出现矛盾,早期报人的办报理念和办报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早期报人在接触西方报业和自己独立的办报实践中,对于报刊客观性的认识和了解还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但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自身认识框架下已经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

## The Research on Liang Qichao's Objectivity Thoughts of Press

SUN 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P. R. China)

**Abstract:** Objectivity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ccompani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modern press industry. Liang Qichao has a unique perspective of the objectivity because of his rich experience of administrating a newspaper. There are many materials about the objectivity in his books and newspaper practice. However, there were many flaws in the early objectivity thoughts because of the spe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their own limitations. The objectivity of press was conflic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eanwhile, the journalists thought the objectivity as a political tool and strategy.

**Key words:** Liang Qichao; newspaper; objectivity

[责任编辑:以沫]

①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见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56页。

② 黄旦、严慧颖:《从新闻史看新闻宣传与新闻失实》,《新闻界》1998年第3期。